

重建区隔与自我认同： 中唐时期的“华夷”书写与思考

刘 顺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中唐族群格局的变化改变了唐人对于“华夷”的体认与书写,与震惊、愤恨乃至伤痛心理相对应的生活场景,如女性服饰、河北胡化及士人走胡走燕成为常见的文学意象。在意象类型的叠加书写中,“天下一家”的原有心态渐次转换为“此疆彼界”的区隔意识。“边界”为“华夏”认同之基本要件的传统重被唤醒,但在李唐已无力扩展地理疆界的现实条件之下,稳定“中国”的内涵,则不得不将焦点自“外在的边界与异己感”转向“内在的边界与认同感”——一种近乎本质主义的思考被渐次强化,皇甫湜对于“权统”与“文化中国”要件的关注与论述,可谓中唐思想于此问题的重要创获。

关键词: 中唐时期; 胡化; 区隔; 自我认同; 权统; 文化中国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4)01-0160-04

安史之乱,惊破了盛唐之梦,也颠覆了李唐在胡汉交往史中的主导位置。大唐的历史命运,被动裹挟于吐蕃、回纥等异族势力生存态势的消长变化。日常生活的“胡化”被不断书写、放大并进而重构着唐人的历史记忆。曾有的“天下一家,万国来贺”的大国想象,逐步为“此疆彼界”的现实体认所置换,李唐进入了一个布满危机的时代。随着中唐社会步入稳定,因安史之乱而生的时代体验,也自然而然地明晰而类型化,生活体验的书写虽然仍在继续,但不囿于此,试图理解危机并尝试寻找应对危机的思考却呈现出强势增长的态势。由于中唐社会的危机以族群危机为契机而触发,故而,中唐士人的危机思考必然含有族群区隔与自我确认两大向度。危机应对改变了唐人生存体验之书写,也推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

一、中唐的“胡化”体验之书写

李唐王室本为起源于北朝且高度胡化之汉人,无论以血统论,抑或以文化论,李氏均与此前汉人政权之皇室有异。及李唐承隋末之乱,统合南北,其于胡汉间之差异,亦能持开放而通融之态度。太宗之时,立“王化无外”、“华夷一家”之基调^①,虽高宗以

降,胡汉文武分途,已引起关注,但夷夏无别的政治理念,迄于玄宗依旧遵行不改^②。但是,安史之乱的发生,颠覆了唐人处理夷夏关系的原有传统。相较前期,胡化之影响多行于宫廷及官僚上层,开天以来,胡族文明逐步扩展至市井平民,华夏文明似乎正逐步丧失其范导之力。虽然,此种感受或许是曾饱受战乱之苦的唐人略有夸张的情绪表达,但其背后所传达的是抵御胡化、重新确立自我认同的深层焦虑。唐初以来胡人入居长安者人数甚众,但时至中唐,唐人已渐失曾有的包容,“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③。在胡骑窥边、藩镇跋扈而武人多胡族血统的现实压力之下,曾经视为平常的胡族文化,遂转化为令人忧虑且惊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异类表征。虽然时至中唐,胡族文化已遍及唐人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但在惯以服饰与礼仪为自我标示的汉人心理中,服饰最为日常而易见,然也正因其日常而易见,能于日常行用中彰显差异。从玄宗至穆宗时约百年,妇人之妆饰已屡生变化,其趋势之一为服饰变窄衣短袖为宽衣长袖。在以短窄束身为胡人之服的时代共识之下,服饰变为宽长,已可见出安史之乱后,李唐欲恢

收稿日期: 2013-04-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青年项目“中唐文儒思想与文学研究”(10yjc751052);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唐代中后期的儒学与文学”(2013M541816)。

作者简介: 刘顺,男,兰州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思想与文学。E-mail: liushun226@163.com

复旧风、抵御胡化之努力。白居易《时世妆》以披发伊川为喻,变夏为夷之忧见于形色。可见,当大唐已无法维持曾有的自信与开放之时,日常生活中的胡化遂与家国存亡的命运相关联,而成为令唐人刻骨铭心的象征符号。

除妇人妆饰外,男性的行为选择是广受关注的另一焦点。周孔之教的诗礼之学与斗鸡走马的向武倾向则为判定华夷的基本因素。唐初对于归化和入附胡人的羁縻制度以及中亚游牧民族在族群间关系变动后的自动内迁,构成了众多胡人生活于唐境之内的主因。武曌迄至李隆基,关陇集团已不复唐初之影响力,文武亦由此分途,文武蕃汉进用之途,岐而难合,边镇将帅之任多为胡人,历时既久,胡人聚居之地,多为胡化。原为汉文化高度发达之河北,亦因受科举导向,士族多迁居两京之地,而文教渐失,至有秀才卢需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范阳之地,久历胡化,虽安史乱已平,但安史乱之影响难消。《旧唐书·张延赏传》载:“(张弘靖)充卢龙节度使,始入幽州,俗谓安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幽蓟初效顺,不能因俗制变,故范阳复乱。”弘靖入幽州,距安史之乱已近七十年,但此地胡风不减。习俗不同,所尚有异,当衣冠文明为我族区隔与他族之核心要素时,胡化之地遂成夷狄之所。《新唐书·史孝章传》载:“(史)宪诚得魏,迁士曹参军。孝章见父数奸命,内非之,承间谏曰‘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河朔为与中央对立之区,士人因上升孔道渐窄诸因,以北走胡南走燕为常态,亦可为佐证。

对于胡化的体验与书写,自然刺激华夷关系原则的典范转移,推进知识界对于“边界”、“自我”问题的理论思考。中唐文儒对于衣冠服饰与诗书礼乐的聚焦,则体现出尝试稳定“中国”内核——超越历史时空之“本质”——的思考方向,“地理边界”为确定认同之基本方式的运思路径将由此扭转。

二、“此疆彼界”意识的凸显

“中国”一词,以今日考古学界研究成果而言,首见于西周初期之何尊,所指为地理居中的城或政治体,与后来通行之“中国”概念,差异甚显。及至战国,始与“天下”概念叠合、重构而渐成与四夷相对的“我族”概念^[4]。“中国”或“华夏”成为族群概念,必以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也即自我同质化的建构与体认为前提,以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意识为前提。但是,此时期族群内部的自我同质化,与其说

源于自我认同的自觉,不如说导源于外部压力的策略应对,故而更多停留于基本生活样态的展现与描述。又因此时期地理边界的滑动,华夷身份转换的不确定性,“中国”展现出天下主义的自我中心态势。此种认同构想中,文明中心与地理中心高度重合。据《周礼》,“职方氏”掌天下輿图,其所勾划的“天下”,即华夏之人以为实然之天下,即使在异类文明冲击之下,国人实际的地理知识已隔碍于此地理框架,想象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图景依然影响不衰。“天下”是一个以我族(国都)为中心的回字型或同心圆结构,他族与中心位置的空间距离即是文明位阶的判定标尺。但无论距离远近之殊,中心的文明总有修文德以来之的责任与气度。至司马迁修《太史公书》,“圣王同祖”与“兄弟出走”的统绪设计,为华夏乃至华夷间的认同奠定了重要的血缘想象,“天下”一家、王化无外的理念遂敷展而为处理族群关系的重要原则。然而,当他族强势冲击华夏所主导的族群关系时,无力稳定“边界”的王朝,自然也无力维持“王化无外”的理想,“此疆彼界”的区隔意识由此而被唤醒。

隋末,北部诸雄崛起,奉突厥为大君,势陵中夏。李渊起兵太原,乞力于突厥而有称臣之举,太宗引以为耻。及贞观四年(630年),突厥内乱并罹风雪之灾,李靖等因而击破之,漠北各系力量多臣服于唐,太宗遂有天可汗之号,为农耕与游牧文明之共主,唐人 so 期待之“天下一统”格局初具。在修定于贞观时期的《唐律》中,四夷之人,有“化外”与“化内”之别。“化外人”谓“声教之外,四夷之人”及“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5]化内之人,则为归化或归附于大唐之人,唐主要以羁縻府州加以管理。复又根据所居地点与归化时间以“在蕃/入附”与“熟户/新降”两类区分之。“今诸蕃归降,色类不一。在蕃者则汉官押领,入附者或边陲安置。”^[6]“诸道军城,例管夷落。旧户久应淳熟。新降更仁绥怀。……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国法。”^[7]入附时间既久,汉化既深,则视之为王人。华夷之别,非关乎血缘,而取决于文化。虽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警惕时有回响,但只能成为水下潜流而偶被提及。当大唐盛世的荣光褪却,他者族群以强力冲破原有的华夷格局时,唐人昔日的自信从容破碎而稀薄,曾经的潜流亦因风成浪,只是破碎的版图已再难复原。

在李唐的族群互动中,突厥、吐蕃、回鹘、南诏为能与中国抗衡者。突厥溃败后,吐蕃、回鹘为唐人之

劲敌。天宝六年(747年),高仙芝经赤佛堂攻破小勃律国,延续了李唐在中亚的影响,并暂时确保了丝绸之路的通畅。安史乱起,玄宗立边境十节度以备四夷的制度设计崩溃,丝绸之路中断,安西、北庭成孤悬之城。赤佛堂西本为大唐之地,已入夷狄,虽汉化未绝,但曾有的辉煌已再难重现。“边疆在凤翔”的逼仄之感冲击着唐人——夷族压迫已不再是口耳传闻中的异域鼓噪。

“昔日开天万里疆”的盛景已如烟云散去,唐人已再难拾起曾有的自信与从容。对异族或胡化的排斥,所深隐的是唐人对“何者为我”“如何确立自我”的焦灼与痛苦。伴随“此疆彼界”意识的凸显,唐人笔下的他族形象也随之变化。《旧唐书·吐蕃下》:“乃者吐蕃犯塞,毒我生灵,俶扰陇东,深入河曲。朕以兵戈粗定,伤夷未瘳,务息战伐之谋,遂从通和之请。亦知戎丑,志在贪婪,重违修睦之辞,乃允寻盟之会。果为隐匿,变发壤宫,纵犬羊凶狡之群,乘文武信诚之众,苍黄沦陷,深用惻然。”修德来远、“王化无外”的关系模式,已错位于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历史变局。四夷对于唐人天下构想的冲击,远非佛家知识层面的纠偏可比,当族群的生存命悬一线,而族人之自信遭受重创之际,如何在表达压迫情感之外,于实践与理论层面应对挑战,利用传统如血缘、地理、文化之诸因素,重新确立自我,由之成为一时代知识人的历史使命。

三、何谓“中国”:“自我”认同的思想尝试

“边界”是族群自我确认的重要因素,其形成与维持以特定的资源竞争为核心推力而受制于族群间的势力消长与生存策略。滑动甚或模糊构成了前现代国家之族群“边界”的基本样态,与此滑动与模糊相应,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亦难言清晰明确。看似经典的表述,常不过为精英层的类型想象,而尤难认之为族群内的共识,或以之为族群内的基本生活方式,但随着边界意识的强化,族群内部的自我确认亦常随之而得强化,进而展现出对于族群“本质”的探寻热情。对于“中国”或“华夏”而言,中唐之际成为思考“中国”内部认同的重要节点,并以皇甫湜为翘楚。

在“中国”与“周边”民族的互动关系中,如何确定“中国”的内涵,逐步形成“地理中国”与“文化中国”两大要义。及史学渐兴,“中国”问题遂与“正统”问题勾连为一,王朝“正闰”问题的讨论,成为理解“中国”与其周边的思想场。饶宗颐先生认为初唐王勃及中唐皇甫湜之说为有唐正统论之代表,却

未曾涉及两唐书中虽存踪迹但几成思想史上之失踪者的隋末大儒王通。对于有唐的正统论而言,王通《元经》所持的帝魏之说,无疑是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所欲回应者:

南北之变,吾于《元经》见之也。晋之东,犹汉也。属而继宗,古之制也。其所以贵者,以中土之无代也。君子因其旧而兴之,犹周也。皇始授魏,进之也,天也。而帝晋者,人也。魏可贵而未贵,晋可贱而未贱,故君子待之也。待之者,待其定也。晋、宋有其志,又有其功,而魏未有以胜之。武、文没而孝文兴,于是南北定矣,故宋亡而帝魏也。孝建之后,可以夺矣,而君子不忍者,武、文之泽也,故因其亡而取之。^[8]

在陈师道转述的《元经》正统说中,西晋、东晋为正统,北魏则自道武帝皇始元年与东晋同为正统,从宋被齐篡,则南朝已失正统之位,北魏为唯一正统。《中说》释曰“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穆公之志也。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以明中国之有代,太和之力也。”^[9]推寻王通之意,则北魏为齐篡宋后为唯一之正统,实因南朝诸代既失中原之地,复无收复之志,已自居于四夷,而北魏则既有地理之要件,且又能行中国之道。由此,王通的正统论以“地理中国”与“文化中国”为基本要件,唯两者兼具,方为正统,而胡汉之血统问题不与焉。王通为隋末大儒,而杨隋本出北周实源于北魏,故而,王通之正统论,重文化而尤重地理,亦可言为杨隋之“正统”张目。但在王通的论述中,“文化中国”的问题,并未得到应有之关注,似乎在中古之世“衣冠礼乐”的典型描述已足以界定“文化中国”的内涵。而以两唐书观之,初盛唐时,最具影响的正统理论却是来自与王通大异其趣的后人王勃,据《新唐书·文艺上》载:

又谓“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数尽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数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数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数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数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黄帝至汉,五运适周,土复归唐,唐应及周、汉,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晋以降非真主正统,皆五行沴气。遂作《唐家千岁历》。

王勃之说,以五德终始理论为立论之基,“正统”谱系的构建,所着眼处,要为王朝国祚的短长,

而无关“中国”内涵稳定之问题。虽此种正统学说与有唐立国初期所持“天下一家”理念甚为合拍,但当大唐的盛世落幕,“昔日开天万里疆”的阔大恢弘被“而今边防在凤翔”的逼仄忧患所取代时,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无疑更能应和此时的社会心态:

论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统,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故自尧以降,……以及魏取于汉,晋得于魏,史策记载,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万代无异辞矣。……而拓跋氏种实匈奴,来自幽代,袭有先王之桑梓,自为中国之位号。谓之灭耶,晋实未改;谓之禅耶,已无所传。而往之著书者有帝元,今之为录者皆闰晋,可谓失之远矣。”或曰:“元之所据,中国也。”对曰:“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至于孝文,始用夏变夷,而易姓更法,将无及矣。且授受无所,谓之何哉?”^[10]

皇甫湜以为正统之“正”,“或以德,或以时,或以力,或以义,承授如贯,终始可明”,故而“正”首要之因素即为“权力”来源之问题,北魏虽立国于中原之地,但权力之获取却非正途,此其不正一也。其次,皇甫湜以西晋、东晋及宋、齐、梁为正统所在,持论之据则为文化而非地理、血统为确立正统的根本

要件。北魏虽居有中原之地,但政治文化殊异于以服章与礼乐自认的“诸夏”,自是蛮夷而实非“中国”^[11],此其不正者二也。以周承梁本始于萧颖士,虽萧氏此论或存一姓之私,但于王勃学说之外另树新义,并明标“义理”之修史旨趣,无疑可与大体同时之陈鸿、姚康等人前呼后应,汇成一时代思想之潮流。皇甫湜的正统论,首举“大一统”为正统应具之形态,有似王勃之论,但所论者,非为“地理形态”的大一统,而实为权力获取方式之合统——后世“治统”之说当有取于此。由此,则“四夷交侵”之时,“华夏”犹可以避地之方式,存命脉于一线。李唐迫于四夷、藩镇及后世华夏衣冠再次南渡均可因此而得一解释。其以周承梁黜北魏于闰位,确认“文化中国”要件的基础地位,亦可见出在李唐乱于胡族并为四夷交侵的时局之下,标榜“文化中国”、区隔“自我”与“他族”,并进而稳定“自我”内涵之苦心。

烙印于唐人生存体验中的中唐危机,不但深度改变了唐人对于“胡人”及胡化的体验与书写,也强化了唐人的族群区隔意识,“此疆彼界”逐步成为唐人处理族群关系的根本原则。与此同时,关于“何为中国”问题的思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发端于王通、王勃的李唐“中国”思考以皇甫湜之思考为其顶峰,“文化中国”与“权统”要件之影响扩大,北宋初石介《中国论》可谓此思考之后代嗣响。

参考文献:

- [1] 司马光. 资治通鉴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1589.
- [2] 傅乐成. 汉唐史论集 [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1: 209-226.
- [3] 李昉. 太平广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3995.
- [4] 张其贤. “中国”概念与“华夷之辨”的历史探讨 [J].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博士论文, 2009: 183.
- [5] 刘俊文. 唐律疏议笺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1191.
- [6]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 [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91: 507.
- [7] 王钦若, 等. 册府元龟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11652.

- [8] 陈师道. 正统论 [M] // 陈师道. 后山丛谈: 卷1.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
- [9] 王通. 中说 [M] // 王心湛. 文中子集解. 上海: 广益书局, 1936: 36.
- [10] 皇甫湜. 东晋元魏正闰论 [M] // 董诰. 全唐文.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7031.
- [11] 刘顺. 个体记忆与文化生产——柳宗元的南方生活 [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3(3).

(责任编辑 王 平)